

南非环境史研究概述^{*}

包茂宏

【内容提要】 南非环境史研究是修正派史学发展、相关学科渗透和客观现实要求的产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南非环境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国家公园的建立、环境保护主义的形成、人与环境的关系、城市环境变迁、自然灾害和可持续发展等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基础薄弱、种族偏见和缺乏宏观整体研究。随着南非社会的进步和史学的发展,南非环境史研究将得到更大发展。

【关键词】 南非 环境史研究 史学史 环境主义运动

【作者简介】 包茂宏,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通信地址:同工作单位;邮编:100871。

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南非环境史研究正式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此之前,个别南非史学家也注意到了环境问题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例如, B. H. 狄克早在 1932 年发表的《采采蝇对南非历史的影响》一文,对范伦斯堡大迁徙的失败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这支迁徙队伍并非像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定的那样是被马库来克族和马伦格委族的阿马通加人消灭的,而是由于他们贸然闯进德兰士瓦的采采蝇地带造成牲口死亡和牛车阵解体而最终彻底失败。¹狄克对历史的解释属于“边疆史学派”。从总体来看,该学派更多关注阿非利卡人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立国精神和民族精神,环境相对于经济基础和种族关系而言只处于历史叙述的可有可无的边缘。1958 年, F. J. 玻特吉特发表了《1837~ 1886 年白人在德兰士瓦的定居》一文,重点分析了白人对当地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影响白人定居模式的环境因素,呼吁政府应尊重当地人因采采蝇和锥体虫病存在而采用的冬夏异地

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④他的研究主要采用新兴的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真正从环境史角度来研究南非历史上人与环境关系的,是从 1980 年 J. 加易发表《恰卡和祖鲁王国崛起中的生态因素》和 1984 年 W. 贝纳特发表《南非 1900~ 1960 年的土壤侵蚀、保护主义和发展思想》开始的。^(四)

南非环境史研究一经出现,便迅速发展。1985 年在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召开的“1884~ 1984 年非洲环境保护”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南非环境史研究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南部非洲经济史学会和纳塔尔大学先后召开了重点讨论南非历史上人与环境关系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南非开普敦大学欧文·西乔内 (Owen Sichone) 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

¹ B. H. Dicke, “The Tsetse-fly’s Influence on South African Histor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29, October, 1932.

^④ F. J. Potgieter, “The Settlement of Whites in the Transvaal (1837-1886)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Environment”, *Archives Year Book for South African History 1958/59* (四), Cape Town, 1959.

(四) Jeff Guy, “Ecological Factors in the Rise of Shaka and the Zulu Kingdom”, in S. Marks & A. Atmore (ed.),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Longman, 1980; W. Beinart, “Soil Erosion, 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 A Southern African Exploration, 1900-1960”,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1(1), 1984.

1999年在牛津大学召开了“非洲的环境：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讨论会，重点研讨南部非洲和东非的环境史。《南部非洲研究杂志》和《环境与历史》相继在1989年和2000年出版了关于南非环境史的专辑。南非主要大学的历史系都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环境史课程。环境史逐渐成为南非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南非与美国都有研究边疆史的传统，环境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边疆史中衍生出来的。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环境史研究，非洲的环境史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¹ 南非的环境史研究为什么滞后了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南非既没有产生强大的环境主义运动，也没有广泛的对外学术交流。环境主义运动是环境史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动力，它从现实需要出发向历史研究提出要求，寻求运动发展的深沉历史感，并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指导运动的顺利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把环境史研究变成了当代史，有利于吸引更多历史学家从事研究和唤起大众的关注与支持。但是南非的情况非常特殊，种族隔离政策的推行使少数白人拥有大量土地，生活在非常优美的环境中；而广大黑人生活在面积极其狭小的黑人家园中，他们因生计困顿而没有关注环境的兴趣和精力。班图斯坦“自治”或“独立”后，这些地区最严重的环境退化就成了与白人没有关系的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即使白人政府此时实施某些改善环境的计划，也是在做表面文章，其最终目的是维护种族统治的大局。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压力日渐加强，种族主义开始松动，一些开明的白人中产阶级人士开始改变观念，关注全国特别是黑人的生存环境。一些生活在城市的黑人在黑白人生活环境相差悬殊的强烈刺激下，在争取公民权的同时开始要求自己应有的环境权。环境主义运动在南非开展起来，它催生和推动了南非环境史的发展。

实行种族主义使南非在国际社会上几乎完全孤立，严厉制裁使之对外部世界的新生事物知之甚少。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的环境主义运动和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全球人类环境会议在南非几乎没有产生回响。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以及欧美国家的正常学术交流几乎中断。西方

国家的环境史研究影响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但对南非环境史的诞生在当时并未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南非环境史是在内部逐渐萌芽和形成的，其中有两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修正派历史学不断扩大研究范围；二是南非其他关注环境问题的学科对历史研究的渗透和交叉。

二战后，南非史学史中的三个流派进行了激烈争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史学通过历史研究为种族主义辩护，弘扬其优越的民族精神，贬低非洲人的历史创造力。自由派史学只重视种族关系的研究，认为种族隔离是阿非利卡人种族偏见的产物。修正派史学变相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批判前两者的观点，认为阶级利益是南非历史发展的主题，种族隔离不过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一种体制，注重研究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及白人工人阶级的特点。在相互辩论中，修正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吸收了其他两派的合理内容，特别是受索维托惨案的影响而把研究范围扩大至黑人的历史，重点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对非洲人社会的冲击、黑人对白人的阶级反抗、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关系、殖民以前黑人各族的历史发展等。在研究深入进行的过程中，修正派史学家发现了生态环境因素在黑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研究农村黑人的抵抗过程中，注意到了生态恶化与土壤保护所起的独特作用。^④从修正派中长出的环境史萌芽与80年代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相互交织和促进，共同催生了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南非环境史。

南非关注环境问题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历史学家探讨环境史的积极性。全面制裁严重影响了南非历史学的对外交流，但并未妨碍自然科学和法学等一些实用性强的学科对全球环境运动作出回应。20世纪70年代相继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书籍，其中也涉及环境问题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

¹ 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④ C. Saunders, “Historians and Apartheid”, W. Beinart, “Agrarian Historiography and Agrarian Construction”, in J. Lonsdale (ed.), *South Africa in Question*, Heinemann, 1988, pp. 13–32, 134–153.

等方面的内容。¹ 这些研究在大众中引起一定反响,但也明显地侵入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地。历史学家一方面批评他们的研究过分技术化、没有历史深度,另一方面为捍卫自己的学术领地、夺回本属于自己的发言权而把不同流派的纷争置之脑后,积极投身于环境史研究。

总之,南非环境史研究主要是由南非历史学的自然发展和相关学科的刺激以及环境运动的要求这三者共同作用而兴起的。南非环境运动的出现比国际上晚近 20 年以及南非因实行种族隔离而与世隔绝,造成南非环境史的出现晚于美国和非洲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非的环境史。

环境史研究的主要领域

南非环境史研究兴起虽晚,但发展得相当快。如果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还局限于环境保护政治史的话,那么在 90 年代可以说是全面开花,迅速与国际环境史研究接轨。研究人员急剧增多,选题多样化,新成果纷纷涌现,新见迭出。下面将从 7 个方面进行综合概括。

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W. 贝纳特 1984 年发表了《1900~1960 年南非土壤侵蚀、保护主义和发展的思想》一文,揭开了研究南非土地利用和保护史的序幕。他的一系列论文为这一领域确立了基本研究框架,即南非的土壤侵蚀主要不是由非洲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顺坡耕种、“牲口情结”、过度放牧、分散居住和一条线走路等)造成的,而是由白人引进受世界市场拉动的商品化农业和畜牧业导致的过度开垦和放牧造成的;白人政府的改良计划(集中居住、减少牲口数量、等高线种植等)表面上是为了改善环境,实质上是为了改变黑人文化,把黑人永远固定在保留地,阻止其城市化进程并永远为白人服务。^④此后,许多学者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分别从土地退化、计划的设计和实施、非洲人的抵制以及保护的种族分野等方面对这一范式进行了实证的解释和完善。^⑤森林是地球的肺,不但能净化空气、保持水土,还能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需的燃料和薪材。南非在发现煤以前,一直以树木为燃料。金矿和金刚石矿发现后,对燃料的需求大增,特别是木材业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后,森林采伐进入掠夺性阶段,造成生态环

境破坏。政府虽然在 1890 年颁布了保护森林的法令,但历史学研究发现,由于人口增加、工业和铁路扩展以及非洲人的持续贫困化,这些法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森林面积仍在减少。^{1/4}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对野生生物保护史的研究是由 J. 卡若瑟斯开创的。她以德兰士瓦为基地研究了国家公园的建立和保护动植物法令的演化,批驳了把克鲁格当成是创立庞果兰和沙比动物保护区、具有环保思想的总统的流行说法,指出他根本没有保护野生生物的意识,建立保护区不过是出于政治考虑,是对官员、议会以及大众呼吁的不得已的回应,以他的名字命名国家公园并不是对他关心环保的奖赏,而是为了利用他在阿非利卡人中的影响力来获得他们对建立国家公园的支持。德兰士瓦颁布的保护法令最先是为了反对白人过度狩猎造成的野生生物资源减少,但随着政治的发展,该法令逐渐演变成禁止非洲人进入和利用保护区及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进而污蔑土著人的生产是过度狩猎。^{1/2}继卡若瑟斯的研究之后,南非环境史学家先后对纳塔尔、奥兰治自由邦和开普殖民地的自然保护展开研究。S. 布鲁克斯通过质疑流行的纳塔尔自然保护史的说

¹ M. A. Rabie,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Pretoria, 1976; A. C. Brown (ed.), *A History of Scientific Endeavour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1977; R. F. Fuggle & M. A. Rabie (eds.),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South Africa: Techn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Cape Town, 1983.

^④ W. Beinart,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2), 1989.

^⑤ F. Hendricks, "Loose Planning and Rapid Resettlement: 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and Control in Transkei, South Africa, 1950-1970", C. de Wet, "Bettelement Planning in a Rural Village in Keiskammahoek, Ciskei", P. McAllister, "Resistance to 'Bettelement' in the Transkei: a Case Study from Willowvale District",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2), 1989; P. Delius & S. Schimer, "Soil Conservation in a Racially Ordered Society: South Africa 1930-1970", M. T. Hoffman & S. Todd, "A National Review of Land Degradation in South Africa: the Influence of Bio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6(4), 2000.

^{1/4} J. Tempelhoff,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Northern Transvaal Wood Resources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Conservation Measures", D. P. McCracken, "Qudeni: the Early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an Indigenous Zululand Forest", *South African Forestry Journal*, 142, 1987.

^{1/2} J. Carnuthers, *The Kruger National Park: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ietmaritzburg, 1995; H. Grobler, "Dissecting the Kruger Myth with Blunt Instruments: a Rebuttal of Jane Carnuthers' s View", J. Carnuthers, "Defending Kruger' s Honour? a Reply to Professor Hennie Grobler",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2(3), 1996.

法,提出祖鲁兰的自然保护在1900~1930年间经历了从理想的非功利性保护到实用的利用性保护的转变,造成保护区以外的动物得不到官方保护、对黑人的悲惨处境缺乏了解和重视的后果,进而揭示了自然保护与殖民征服、生态中断和发展失败的复杂关系。¹ C. 卢克斯认为,由于自由邦政府和布尔人利益集团缺乏对自然保护的興趣,致使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几近灭绝。英国接管这一地区后加强了动物保护立法,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自然灾害和英布战争后英国殖民地当局同阿非利卡人紧张关系的影响而没有发挥应有作用。^④

环境保护主义 R. 格罗夫深入研究了开普殖民地环境主义思想的起源,认为它是英格兰传教士的福音派思想、来自热带岛屿和其他殖民地的保护思想以及欧洲的科学保护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并非完全是从美国引进的。^(四)在南非环境主义形成过程中,科学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表现为植物园的设立和殖民地植物学家的研究、宣传和咨询作用。植物园之间互相引进和交流物种,植物学家运用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研究南非的植物分类、地面植被覆盖、局部大气循环、降雨和水土流失的关系,为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具体建议和方案。^{1/4}南非当代环境主义一直是个谜,P. 斯戴恩的研究初步揭开了这个谜底。她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南非环境主义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全面制裁造成政府只关心经济增长而甚少参与国际环境革命,非政府组织也因此反对把环境问题当政治问题对待,而只关心动植物的保护。但在1988年“地球生命非洲”成立后,非政府组织在短短几年内就把广泛的环境退化与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种变化是与南非的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在自身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新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南非环境主义运动融入到了国际社会。^{1/2}

非洲人与环境的关系 白人一直认为黑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利于环境保护,环境史学家的研究在大多数领域和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这种观点。J. 加易用环境因素来解释恰卡统治下的祖鲁社会结构的变迁,认为同龄兵团制度的引入是对18世纪末生态危机和19世纪初大饥荒的必然反应。国王对女性结婚年龄的限制和对男性为王室放牧牲畜及耕种土地的要求都有效控制了人口增

长,提高了对环境的利用率,使人能与环境长期和谐共处。殖民者侵入后,这种关系被打破,例如科伊人因荷兰人殖民和大迁徙而失去水源和牧场,致使其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无法继续维持而被灭绝。这种观点比传统的认为科伊人是死于天花的流行说法更有说服力。^{3/4}针对传统自然保护史中的白人中心论和污蔑黑人的倾向,F. 卡恩研究了1918年成立的“土著农民协会”,发现它是第一个反对传统的、在黑人中正式宣传环境保护伦理的黑人组织。它所从事的争取土地权、培训黑人农民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有助于南非非政府组织的保护思想从以野生动物为中心的非功利性主义向整体论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态转化。这样的研究可以改变南非环境史中的种族主义气息,写出一部完整真实的南非环境保护史。^⑤

城市环境史 南非的城市化是随着殖民者的入侵和两矿发现带动的工业化而发展的,与此同时基本上形成了种族隔离的分裂社会结构,因而

¹ S. Brooks, *Playing the Game: the Struggle for Wildlife Protection in Zululand, 1900-1930*, Kingston, 1990.

^④ C. Le Roux, "Game Protection in the Orange Free State 1848-1910", *Historian*, 44(2), 1999.

^(四) R. Grove, "Scottish Missionaries, Evangelical Discourse and the Origins of Conservation Thinking in Southern Africa 1820-1900",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2), 1989; R. Grove, "Early Themes in African Conservation: the Cape in the 19th Century", in D. Anderson & R. Grove (eds.), *Conservation in Africa: People, Politic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1987; R.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1995; R. Grove, *Ecology, Climate and Empire: Colonialism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1400-1940*,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7.

^{3/4} R. Grove, "Scotland in South Africa: John Croumbie Brown and the Roots of Settler Environmentalism", W. Beinart, "Vets, Viruses and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ape", in T. Griffiths & L. Robin (eds.), *Ecology and Empi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ettler Societies*, Pietermaritzburg, 1997; D. P. McCracken & P. A. McCracken, *Natal: The Garden Colony, Victorian Natal and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Johannesburg, 1990.

^{1/2} P. Steyn & A. Wessels, "The Roots of Contemporary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in South Africa 1654-1972", *New Contree*, 45, September 1999; P. Steyn, *Environmentalism in South Africa 1972-1992: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Orange Free State, 1998.

^{3/4} L. Guelke & R. Shell, "Landscape of Conquest: Frontier Water Alienation and Khoikhoi Strategies of Survival 1652-1780",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Studies*, 18(4), 1992.

^⑤ F. Khan, "Rewriting South Africa's Conservation History: the Role of the Native Farmers Associ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0(4), 1994; F. Khan, "Soil Wars: the Role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Soil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in South Africa 1953-1959", *Environmental History*, 2(4), 1997.

南非城市也分为有规划的白人城市和没有规划的黑色城市。在白人城市,规划是以为白人服务为宗旨的,黑人居住区变成了最肮脏和倾倒有毒废弃物的场所,没有清洁用水和垃圾处理设施,随意用煤和薪材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在黑人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危害更大。在临近工矿业的城市,黑人世代饮用的河流和泉水被严重污染,引水工程也把黑人排除在受惠者之外。黑人居住区疾病流行,但没有大众医疗体系,酿成多次严重的环境事故。白人政权多次根据形势需要调整种族隔离政策,把黑人拴在保留地进而使之成为只能在恶劣环境中工作和生存的流动劳工。黑人由于职业中的种族隔离无法进入劳动条件好的工种,因而不但没有基本的环境权,更有可能改善环境,这就形成了严重的环境种族主义。与美国相比,因为黑白人之间几乎不能流动,所以南非的种族、阶级和环境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比美国的要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了黑人的选举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环境种族主义,因为环境问题是一个影响深远、错综复杂的疑难症结。¹

自然灾害史 南非自然灾害种类繁多,过去都是从农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环境史兴起后,学者们对此进行重新研究。19世纪末,牛瘟流行造成黑人的牛群锐减,进而改变了黑人传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白人政府因为不愿也不能控制疾病而被黑人认为是毒死牛群的罪魁祸首。随后发生的红蝗虫灾几乎吃光了黑人的庄稼,导致大规模的饥荒。殖民政府表面上宣传要让黑人从事工资劳动以度过饥荒,但迟迟没有行动。白人农民曾想杀光野生动物以防采采蝇传播流行病,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危险举措。如果说这些疾病都是南非土生土长的话,那么葡萄病的流行却是从欧洲传来的。该病在1861年从美国传入法国,不久传遍欧洲和澳洲,1886年传入南非开普殖民地并迅速蔓延开来。葡萄农被迫迁往别处或放火烧掉葡萄园,殖民政府束手无策,惟一的补救措施是重新引种美国有抗病力的葡萄。南非会周期性发生旱灾,尤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最。当地人传统的救灾方式是莱策玛(Letsema)和玛非萨(Mafisa)制度。玛非萨制度就是为保证在干旱和粮食短缺期间最大效率地利用牲口而进行集体建设和耕种。莱策玛制度就是通

过帮助族人进行季节性劳动来分享牲口和农具。但这些传统方法在种族隔离造成的农村普遍贫困化时期失效了,外迁的路也被堵死,非洲人只能被动等待政府援助,抗灾的能力减弱。^④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自然资源,造成环境退化。政府通过环境立法和行政干预不但没有防止环境破坏,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环境退化。民主化进程启动后,南非逐渐回归国际社会,开始切实进行环境保护,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南非政府颁布了《建立南非的可持续发展基础》的报告,成立了“南非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环境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各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1994年制定的新人口政策旨在改变现有人口发展趋势,协调人口、环境和发展的互惠关系。“整体的环境管理”计划要求任何开发项目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都要进行环境风险评估,使城市建设适合人的居住环境。南非还签署了《防治沙漠化国际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巴塞尔公约》等,并利用国际资金、技术和经验促进大气、水源、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的保护利用,控制有害废弃物的泄露和随意排放,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④

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与美国的环境史研究相比,南非环境史研究

¹ S. Parnell, “Creating Racial Privilege: The Origins of South African Public Health and Town Planning Legisl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9, 1993; J. Beall, O. Crankshaw & S. Parnell, “Victims, Villains and Fixers: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Johannesburg's Poor”,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6(4), 2000; M. Ramphela & C. McDowell, *Restoring the Land: Environment and Change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Panos, London, 1993.

^④ P. Phoofofo, “Epidemics and Revolutions: the Rinderpest Epidemic in Late 19th Century Southern Africa”, *Past and Present*, 138, 1993; C. Ballard,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Rinderpest: Cattle Plague and Peasant Decline in Colonial Natal”,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19(3), 1986; D. J. Van Zyl, “Phylloxera Vastatrix in the Cape Colony 1886-1900: Occurrenc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 16, 1984; C. H. Vogel, “People and Drought in South Africa: Reaction and Mitigation”, in T. Binns (ed.), *People and Environment in Africa*, Chichester, 1995.

^④ J. Cook & E. Koch (eds.), *Going Green: Peopl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1991; A. G. M. Ahmed & W. Mlay (ed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从一开始就紧紧扣住环境变迁与种族关系这个主题,把环境问题与经济利益、阶级关系和政治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从而既有效扩大了传统南非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深化了研究内容和成果,又突破了传统环境史研究只重视环境保护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局限。也就是说,南非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挥了后发优势,迅速进入了当前国际环境史研究的主战场,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南非环境史研究与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关系极为密切。白人政府推行种族隔离制度阻碍了南非环境史的兴起和对外交流,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改革和废除有力地促进了南非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在南非国内,对历史上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研究也会引起现实中关于黑人生产方式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激烈争论。环境史学家揭露和批驳白人对黑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诬蔑,不但为推翻种族主义统治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重新激起了黑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探讨黑人环境观及其实践的研究。

南非环境史研究非常注重个案研究和实地研究。每个环境史学家都是就某个地区或某个环境事件、某个环境组织进行层层剥笋式的深入细致的剖析,研究成果既精致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环境史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它需要对所研究的地域环境有清楚的感受,加之不同地域的环境差别很大,这就需要环境史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要非常小心,在进行研究时要注重实地考察。

然而,南非环境史研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具体可分析如下:

1. 南非环境史研究是从修正派史学中脱胎出来的,至今仍带有极强的修正派色彩,显得专业性不够。主要表现为其理论基础并非完全依赖建立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之上的当代环境主义,并不是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去分析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它虽然在研究选题、范围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但在理论上仍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仍然把环境视为因对人有用而存在的外在事物,积极肯定利用性保护主义,没有看到环境的内在价值。

2. 南非环境史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分裂的烙印,在分析白人和黑人的环境实践时都有矫枉过正之嫌。把白人的一切环境思想和实践都

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过分赞美黑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实际上有种族偏见。当然这与南非修正派史学把研究中心转向农村黑人和南非实现和平民主过渡后黑人翻身当家做主有关,但科学研究还是要剔除种族仇恨,客观公平地对待历史上的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与环境关系的演变,在加强对黑人环境史研究的同时不要一味故意贬低白人曾经进行过的科学保护尝试。

3. 南非环境史研究注重微观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造成了对宏观问题研究不够、过分“碎化”的现象。W. 贝纳特曾经尝试整合南非环境史(也是惟一一想这么做的环境史学家),但他只分析了南非驯化自然的历史(包括狩猎、林业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设立),没有论及在南非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南非环境史的缺憾。¹ F. 卡恩声言要重写南非环保史,但也只注意到了以前被忽略的黑人环保史,而黑人主要生活在农村和后来的“黑人家园”,更何况环保史只是环境史的一个部分。南非环境史研究应该加强贯通古今、涉及全面的宏观研究。

总之,南非环境史研究在短短 20 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形成了历史学中引人注目的分支学科,但也存在理论基础薄弱、有变种种族主义倾向和宏观研究不够等问题。这是南非史学传统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随着新南非建立后黑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南非史学与国际史学的融合,南非环境史研究在新世纪一定会弥补缺陷,得到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吴传华;责任校对:徐 拓)

¹ W. Beinart & P. Coat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Taming of Nature in the USA and South Africa*, Routledge, 1995.

Palestinian– Israeli Security Dilemma and U. S. Middle East Policy

Sun Shoupeng

pp. 4– 6

Palestine issue is the core of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Security dilemma is not only the main problem that besets both Palestine and Israel, but also the root of the continued bloody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Peace with deterrence can only keep a state safe, but not the civilians. Only peace with cooperation

can bring about real peace and get the two sides out of the vicious circle of security dilemma. As a sole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Middle East policy can determine to some extent the progress of the peace process.

Nation– building in African Countries: Theory and Practical Research

——With Comments on Ujamaa' s Role in Tanzania' s Nation– building

Li Anshan

pp. 7– 13

Nation– building in African countries experienced a highly explicated and even painful process. However, it is this very process that makes African people come to know that ethnic conflicts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nd the living of its people, but also menace social order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needs a united nation, so nation– building becomes an important task for many African countries. During the course of nation – building, many African political leaders chose socialism as official ideology, which attributed much to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Connotation of Mbeki' s Idea of African Renaissance

Zhong Weiyun

pp. 14– 17

After more than 4 year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Mbeki' s idea of African Renaissance has become an ideology covering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personal political label for Mbeki himself, and a guide to South

Africa' s foreign policies. It advocates liberal democracy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olitically, and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less state intervention economically, so as to enable African economy to merger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more deeply.

A Review of South Africa' s Environment History Research

Bao Maohong

pp. 18– 23

Research on history of environment in South Africa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visionist history, of infiltration of interrelated disciplines, and of the need of objective realities. Its achievements in the 1990' s lie in such research field as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s,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the nature, changes of city environm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tc. Weakness in theoretical base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ck of macro– research prove to be its main problems.